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礼记全译孝经全译

(上)

(修订版)

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奖

吕友仁 吕咏梅 译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K892.9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礼记全译·孝经全译

(修订版)

吕友仁 吕咏梅 译注

上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第一版)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再版说明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

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但古人留下的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当下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且以往坊间的不少古籍今译的读物，大都难尽人意：

——选译本。如《国语选译》《诗经选译》等。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选”是一种评论的方式。鲁迅先生曾指出，如果对陶渊明只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那就很难使读者对陶渊明的“全人”有完整的认识，若“再加抑扬”，就“更离真实”了。所以说选译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白话本。如《白话史记》《白话搜神记》之类。这类今译本有的置原文于不顾，随意增删敷衍，从严格意义上已不是原书；有的译文尚称严谨，但无原文对照核查，欲引用古人文句还要另觅原书，难称

人意。

——单译本。这类书最多，译文之外附有原文、注释，其中也不乏质量较高者。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缺乏学术系统性，读者买到一本算一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全面。

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书行天下，道亦随之，既有品味，又有普及，为大家营造出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知识境界广博、思想空间深邃的精神沃土，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孜孜追求。此次修订是在前辈学人呕心沥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认真的审读和勘校，是在“国学热”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提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亦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今日重现书界，必将旋起一种新的阅读风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形成当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化人文文化的进程中对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经典不腐更不朽，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天光云影，亘古永在。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

前言

一、关于《礼记》的书名

《礼记》一书之得名《礼记》，始于西汉。如《汉书·韦玄成传》云：“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记·王制》及《春秋穀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

在西汉，《礼记》亦单称《礼》，或单称《记》。如《汉书·孔光传》云：“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光，皆引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王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定陶王宜为嗣。”又《通典》卷八十三引戴圣《石渠礼论》云：“闻人通汉问曰：‘《记》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皆不能明。”按《孔光传》所谓“《礼》曰”云云，见《礼记·檀弓上》；《石渠礼论》所谓“《记》曰”云云，见《礼记·杂记上》。

魏晋以后，《礼记》更有《小戴礼》之称。如《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谓《小戴礼》。”我在这里引证陈邵的话，其意仅仅在于指出魏晋时已有《小戴礼》之称，至于“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谓《小戴礼》”的说法，今日学者已悉知其误，兹不具论。

麻烦在于，《礼》《礼记》《小戴礼》之名，在两汉时，并非为四十九篇之《礼记》一书所专用，十七篇《仪礼》，彼时也有《礼》《礼记》《小戴礼》之称。皮锡瑞《经学通论》云：“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分辨颇为明析。《后汉书·儒林传》中再三提到的《小戴礼》，是指戴圣所传的十七篇《仪礼》，也不是四十九篇的《礼记》。明白了这种二书共名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认识上的错

误。之所以产生这种二书共名现象,从内因上讲,主要是由于《仪礼》和《礼记》二书的内容紧密相关。论其本源,《礼》《礼记》《小戴礼》之称,本属于十七篇之《仪礼》,后来渐次为四十九篇之《礼记》所夺。故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云:“自魏晋号四十九篇为《礼记》,亦谓之《小戴礼》,而东汉十七篇之名《礼记》名《小戴礼》者,又为四十九篇《戴记》所夺,于是别号之为《仪礼》。”

二、《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与作者

就十七篇之《仪礼》与四十九篇之《礼记》而言,二者在两汉的地位甚不相侔。当时立于学官的《礼》,是十七篇之《仪礼》,不是四十九篇之《礼记》。在两汉时,《仪礼》是经,而《礼记》不是经,只不过是《仪礼》的附庸而已。今之所谓《礼记》者,“礼”,指《礼经》,即今之《仪礼》;“记”,犹如学习《礼经》时的笔记,它显然不是正式教材,只是附属于经文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可以对经文进行某种解释、补充或归纳。

《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郑玄认为是西汉的经学家戴圣。他在《六艺论》中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由于《汉书·艺文志》没有明确著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其编者,郑玄的这个说法便是最早最权威的了。现代学者洪业先生对此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今本《礼记》虽与戴圣不无瓜葛,但并非戴圣一人所编。而是在戴圣之后,郑玄之前,今礼之界限渐宽,家法之畛域渐灭,而《记》文之钞合渐多,不必为一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详见其《礼记引得序》。其说颇有益于人们进一步思考,但尚不足以推翻传统旧说,盖证据犹不足也。

《礼记》四十九篇的作者,也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为《礼记》作注的郑玄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为《礼记》作疏的孔颖达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后人就更不消说了。除了个别篇的作者可以指实以外,大多数篇的作者无法指实。孔颖达就老实地承认:“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①。”《汉书·艺文志》礼家所载的“《记》百三十一篇”,可以说是今本《礼记》的最主要的源头,说到这百三十一篇的作者,班固也只是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既然我们无法逐篇地指实作者,那么,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恐怕还是可取的。“七十子后

^① 《礼记正义》卷一。

学者”这一概念所含的历史跨度甚大,可以说上起春秋,下迄西汉(如果采用洪业先生之说,则是下迄东汉),从亲聆孔子教诲的七十子之徒,到西汉的儒者,都包括在内。这里应该指出,《礼记》中有许多“孔子曰”、“子曰”、“子言之”一类的字眼,有的整篇都是“子曰”、“子言之”。孔颖达认为这都是孔子的话,其实并不尽然。对此,梁启超曾加以澄清:“各篇所记‘子曰’、‘子言之’,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盖战国、秦汉间,孔子渐带有神话性,许多神秘的事情皆附之于孔子,立言者因每托孔子以自重。要之,《礼记》所说,悉认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需慎择也^①。”

三、《礼记》的内容与《礼记》的地位的日益提高

《礼记》四十九篇的内容相当杂,据刘向《别录》的分类,或属制度,或属通论,或属明堂阴阳,或属丧服,或属世子法,或属祭祀,或属子法,或属乐记,或属吉事,共九类,每类的篇数也多寡不等。因其内容杂,所以被人们看作是一部儒家的礼学杂编。从今天来看,它是我们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宝贵资料。其中固然有糟粕,但也不乏精华。举例来说,其《礼运》篇中对于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深情描述,《学记》篇中关于教学相长、尊师重教的阐述,并不因其年代久远而略有减色。还有不少章节,富于哲理,意味隽永。继承并进一步发掘《礼记》的积极成分,也是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内容。

我们已经知道,西汉时的《礼记》只是《仪礼》的附庸,《仪礼》是经,立于学官,《礼记》则无此殊荣。但就其对西汉社会政治的影响来看,恐怕在当时《礼记》已经超过了《仪礼》,而西汉后期尤其如此。从《汉书》的记载来看,朝廷在讨论诸如祭祀、宗庙、立储等重大问题时,往往援引《礼记》为说。翻阅《汉书》,这样的例子很多。本文开头举了两个《汉书》的例子,由此可见一斑。王莽改制,其理论根据之一便是《礼记》,尤其是《礼记》的《王制》。即令稍事翻检《汉书·王莽传》,也不难看出此点。至于《礼记》对西汉学术思想的影响,我们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桓宽的《盐铁论》、刘向的《说苑》和《列女传》中都不难找出痕迹。从以上事实中笔者得出这样一种观感,即在西汉时,《礼记》虽然无经之名,但已在很大程度上有了经的实。

^①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东汉末年,郑玄为《礼记》四十九篇作注,这件事可以看作是《礼记》脱离《仪礼》而独立的开始。从此以后,《礼记》的地位日益上升,《仪礼》则日趋式微。曹魏时,《礼记》已立有博士。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①。”这说明当时的学者热衷于《礼记》之学,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到了唐代,《礼记》正式进入经的行列。此时,《礼记》一书,“人皆竞读”^②;而《仪礼》一书,“殆将废绝”。对于《仪礼》来说,真是每况愈下。到了北宋,王安石变法,干脆就废掉了《仪礼》。从此以后,作为经书的《仪礼》,可以说是徒有其名了。

《礼记》与《仪礼》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其原因何在?从古到今,学者无不认为《仪礼》难读。在西汉,连礼学专家徐襄也只能做到“善为颂,不能通经”^③。所谓“颂”,是指具体的礼节动作;所谓“经”,即指《仪礼》。唐代的韩愈在《读仪礼》一文中曾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清代的阮元在《仪礼注疏校勘记序》中也说:“《仪礼》最为难读。”我认为,《礼记》的由附庸变为大国,《仪礼》的由大国而日趋衰落,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用《仪礼》比较难读来解释。如果说难读,“佶屈聱牙”的《尚书》在《十三经》中应该说是首屈一指,但其经典地位却始终岿然不动。我想,原因主要在于《礼记》与《仪礼》二书的内容不同,并因此而影响了人们的对其取舍。《仪礼》十七篇,篇篇都是一大堆繁琐的礼节单,篇与篇之间又多有雷同。《乐记》说:“陈尊俎,列筵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仪礼》十七篇,除《丧服》一篇外,都是这种“礼之末节”。其枯燥无味自不必说了,更严重的是脱离时代,脱离生活。《仪礼》的内容极少具有可塑性,它近乎一堆僵硬的教条。“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④,随着社会的发展,《仪礼》的内容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将其弃之如敝屣也就不足为怪了。《礼记》则不然,它虽然也记载了一些礼之末节,但它也同时论述了这些末节的意义所在;更重要的是,它主要是讲理论,它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

① 《北史·儒林传上》。

②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本210页)。

③ 《汉书·儒林传》。

④ 《孝经·广要道章》。

而这种理论正好满足了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所以赢得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地位日益上升。清代学者焦循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①。”语似偏颇，却也道出了《礼记》日益走红的根本原因。

《礼记》的日益走红已如上述，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似乎《礼记》的风头还没有出够。这就要说到《大学》和《中庸》。《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北宋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到了南宋时，朱熹就将这两篇纳入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从此以后，随着朱熹《四书》受到官方的大力推崇而风行于世，《大学》《中庸》两篇的身价也随之倍增，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家喻户晓之书。这样以来，说到《五经》，有《礼记》；说到《四书》，也涉及《礼记》，真是风头十足。

四、《礼记》的郑注和孔疏

今本《礼记》为郑玄所注。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尝遍注群经，为一代大儒。《后汉书》有传，兹不赘。在郑玄之前，马融、卢植都曾为《礼记》作注。郑玄与卢植同为马融弟子。马、卢之注不传，清人有辑本，但所得也不多。卢植之注，郑玄注《檀弓》“晋献公之丧”节尚偶一用之，而马融之注，则郑注未尝一引。《礼记》之学，从魏晋到明清，其间除了西晋时曾一度使用王肃注、明代曾一度使用陈澧《礼记集说》外，其余各个朝代，无不奉郑注为圭臬。郑玄的注，文简义明，可以说是索解《礼记》的一把钥匙。但毋庸讳言，郑注也有其不足之处。有些注解错误，郑玄本人也知道，但书已作成，追改无及。例如《坊记》注引《卫风·燕燕》之诗，郑注以为夫人定姜之诗，而笺《诗》又以为庄姜之诗。其弟子问其故，郑答云：“注《记》时执就卢君，后得《毛传》，乃改之^②。”王肃的《礼记》注，务在与郑玄立异。王肃的做法虽然是意气用事，门户之争，但所攻郑氏诸点，也并非无一处。如果我们跳出经学家的圈子，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那么，郑注的缺点首先倒不在于某些字句的训诂错误，而在于他作为封建社会经学家的某些错误观点和理论。例如，他笃信《周礼》为周公所作。从而笃信《周

① 《礼记补疏序》。

② 《郑志》卷中。

礼》为周制，而《礼记》中所载制度凡与《周礼》异者，即推之为殷夏之制，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造成是非颠倒。另外，郑注往往征引纬书为说，而纬书之说类多荒诞，这反映了他的宗教神学思想。

《礼记正义》（后来习称《礼记疏》）的作者是孔颖达。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字仲远，一云仲达，两《唐书》均有传。《旧唐书·儒学传》：“太宗以儒学多门，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据《唐会要》，《五经》义疏成书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初名《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五经正义》又经过一次覆审。后来，由于太学博士马嘉运驳正此书之失，太宗又命孔颖达更为详定，功未就而孔颖达去世。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①。皮锡瑞评论此事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经学之又一变也”^②。

《礼记正义》是《五经正义》之一，凡七十卷。其作者一般只说是孔颖达，实际上作者多人。只是由于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所以署名只有孔颖达一人之名，他人之名皆在“等”字之中。南北朝时，学者传习的都是郑注《礼记》，孔颖达等作《礼记正义》，也不例外。《礼记正义》之作，并非空无依傍，一切从头作起。恰恰相反，它是在南北朝学者所作现成义疏的基础上加以剪裁删理。至于如何剪裁删理，详孔颖达《礼记正义序》，此不赘。

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最大特点是申郑，即不随便与郑注立异。他在《正义》中不止一次地宣称：“《礼》是郑学，今申郑义”^③。“此等并非郑义，今所不取”^④。充分体现了“疏不破注”这一特色。当然，这种作法，利弊兼有。郑注说对了的，孔也随之而对；而郑注说错了的，孔也随之而错。应该指出，说孔疏的最大的特点是申郑，并不是绝对的。

① 《唐会要》卷七十七。

② 《经学历史》198页。

③ 《礼记正义》卷五十。

④ 《礼记正义》卷四十二。

如果郑注有明显违背经文之处,孔颖达则舍郑而从经。这样的情况不少。例如,郑注《坊记》曰:“三岁曰新田。”但这和《尔雅》“二岁曰新田”之文明显相违,所以孔氏就说郑注错了。这种不一味盲从的做法,较之魏晋时某些学者“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的做法就显得态度认真些。

孔颖达《礼记正义》的另一大特点是文繁。换言之,就是啰嗦。对于孔疏的文繁,赞誉者有之,非毁者有之。窃以为二者均有道理,并不矛盾。何者?如果繁其所当繁,那自然就是优点。这正如皮锡瑞所论:“孔颖达于《三礼》,唯疏《礼记》,实贯穿《三礼》及诸经。有因《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余字。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又非好为繁博也。学者熟玩《礼记注疏》,非止能通《礼记》,且可兼通群经^①。”如果繁其所不当繁,那自然就是缺点。这正如臧琳所讥:“有一二言意已明了者,加之数十百言,意反晦涩^②。”

五、有关译注工作的交代

首先交代一下所采用的《礼记》经文底本。

我们采用的《礼记》经文出自八行本。八行本是注疏合刻之祖。之所以叫做八行本,是因为此本每半页八行。八行本,又叫越本,这是因为此本初刊于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又叫黄唐本,这是因为主持此本初刻的官员叫黄唐。八行本初刻于宋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是《礼记》注疏合刻最早的本子,也是最好的本子。此本在清代是孤本,陈鱣《经籍跋文》说它“诚希世之宝也”。阮元在校勘《礼记注疏》时,固已心知八行本之善,他本莫及,无奈此本在当时为海内孤本,阮元但闻其名而未尝一见,盖欲求之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求其次,乃以十行本为底本。这是时代造成的遗憾。潘宗周《礼记正义校勘记》说:“《礼记注疏》得阮校而后信为可读,及校此本(按:谓八行本),乃敢言《礼记注疏》以此本为最不贻误读者。”信哉斯言!我们曾经把八行本与今日通行的阮本对校了一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八行本不仅在注文、疏文方面优于阮本,而且在经文方面也优于阮本。例如,《檀弓

① 《经学通论·三礼》。

② 《经义杂记》。

下》“不殆于用人乎哉”，阮本脱“不”字；《月令》“山陵不收”，阮本误作“山林不收”；同篇“度有短长”，阮本作“度有长短”，而王引之《经义述闻》认为作“短长”为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采用八行本，自然就省掉了不少不必要的校勘记。

或曰：为什么不用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唐石经》本呢？答曰：由于岁月侵蚀和后人磨改，今存《唐石经》已大失旧貌。冯登府《唐石经考异》云：“开成去古未远，犹为纯备。然几经后人之手，一误于乾符之修改，再误于后梁之补刊，三误于北宋之添注，四误于尧惠之谬作，遂失郑唐之旧。”这是一。另外，《礼记》中的《月令》一篇，《唐石经》用的是唐玄宗《御删定礼记月令》，和汉人所传的《月令》在文字上有许多不同。这是二。

其次交代一下我们是怎样译注的。除了要遵守出版社规定的全书体例外，在注解时，脑子里始终存在着颜师古注《汉书》时的几句话：“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申，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若泛说非当，芜词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只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①。”我们也知道这样做有点悬得太高，自不量力；但我们还知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的道理。所以我们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不自欺，不欺人。至于实际上究竟做到了什么地步，不敢自必，热诚欢迎读者批评。说到《礼记》的译文，近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最早是台湾，接着是大陆，就像雨后春笋似的，令人目不暇接。尽管其中良莠不齐，但不管怎么说，都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先行者，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简直就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但俗话说文贵创新，有道是见仁见智，人心不同如其面，所以我们的译文还是我们自己的。至于成败利钝，不敢知，幸读者明鉴，不吝赐教。

本书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资助项目。

吕友仁

1997年5月30日

^① 《汉书叙例》。



礼记全译·孝经全译

目 录

礼记全译

前 言	1
曲礼上第一	1
曲礼下第二	42
檀弓上第三	67
檀弓下第四	136
王制第五	186
月令第六	222
曾子问第七	278
文王世子第八	309
礼运第九	326
礼器第十	346
郊特牲第十一	369
内则第十二	395
玉藻第十三	433

明堂位第十四	463
丧服小记第十五	474
大传第十六	493
少仪第十七	502
学记第十八	521
乐记第十九	533
杂记上第二十	569
杂记下第二十一	591
丧大记第二十二	617
祭法第二十三	644
祭义第二十四	652
祭统第二十五	674
经解第二十六	691
哀公问第二十七	696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704
孔子闲居第二十九	712
坊记第三十	717
中庸第三十一	735
表記第三十二	759
缁衣第三十三	778
奔丧第三十四	792
问丧第三十五	803
服问第三十六	809
间传第三十七	815
三年问第三十八	821
深衣第三十九	826
投壶第四十	829
儒行第四十一	837
大学第四十二	847
冠义第四十三	859
昏义第四十四	862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	872

射义第四十六	880
燕义第四十七	887
聘义第四十八	892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898
附 录	904

孝经全译

前 言	909
开宗明义章第一	918
天子章第二	920
诸侯章第三	921
卿大夫章第四	922
士章第五	923
庶人章第六	924
三才章第七	925
孝治章第八	927
圣治章第九	928
纪孝行章第十	930
五刑章第十一	931
广要道章第十二	932
广至德章第十三	933
广扬名章第十四	934
谏诤章第十五	935
感应章第十六	936
事君章第十七	937
丧亲章第十八	938

礼记全译

曲礼上第一

【题解】

本篇题名“曲礼”，是摘取篇首二字为名。至于“曲”字的含义，历代学者说法不一。郑玄、孔颖达认为本篇所记非止一礼，乃吉、凶、宾、军、嘉五礼都有，须要“曲屈行事”，故名《曲礼》。朱熹则认为古经有《曲礼》之篇，此篇乃《曲礼》篇之记，其内容“杂碎”，“不甚伦贯”。孙希旦进一步发挥朱说，认为“此篇所记，多礼文之细微曲折，而上篇尤致详于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法”。比较而言，孙说甚为可取。由于本篇“简策重多”，所以自有郑玄注解以来就分为上下两篇。《礼记》凡四十九篇，《曲礼上》是其第一篇。后可类推，不复赘言。

【原文】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①。安民哉！

注释

①安定辞：郑玄解释为“审言语”的意思，孔颖达更用《论语》的“驷不及舌”来发挥郑说，今未从。孙希旦云：“安者气之和，定者理之确。”今译文从之。

【今译】

《曲礼》上说：一个有地位的人，心中时刻都要有个“敬”字，外表